学术专论

“圣裔”与“圣君”：孔尚任阙里御前进讲的学术和政治

孔　勇

［摘要］ 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康熙帝在首次南巡返程途中亲祭阙里孔庙，临时议定孔尚任等“圣裔”进讲儒家经典，是塑造皇帝“圣君”形象、奠基王朝正统的重要举措。孔尚任受命撰拟《大学》和《易经》两节讲章，历经上谕批驳、臣僚修订，最终方进呈称旨，宣示于外。讲章立意、措辞、格式等环节，与经筵日讲影响下的御纂《日讲四书解义》和《日讲易经解义》高度契合，昭示出阙里讲学意在融学术于政治，化经义为君心，冀收垂范天下之效。儒士大夫将“道统”归于“治统”，虽由此减弱了对皇权的批判力度，却是因应现实所做的主动调整。

[关键词] 康熙帝　孔尚任　阙里　经筵日讲　治道合一

[**中图分类号**]　K249.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5）－05－064－011

清代的统治特点和历史地位等问题，向来是清史研究领域绕不过去的经典话题。近年来，学界重新挖掘并深入阐释清代“大一统”观念的丰富内涵及其实践情形，不仅从宏观上赋予清朝在中国历史乃至全球历史进程中的重要角色，而且为“深翻”清代的诸多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学者注意到，清朝统治者以满洲之身入主中原，注重辨析和借用儒家传统思想资源，尤其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帝接续努力，最终建立了一个消弭华夷界限、突破内外区隔的新型“大一统”王朝。[①] 在此系列举措之中，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一月，康熙帝在首次南巡返程途次亲祭阙里孔庙，且着意安排“圣裔”孔尚任等御前进讲儒家经典，堪称塑造皇帝“圣君”形象、奠基王朝正统的重要一环。以往有关清帝南巡和祭孔的研究不可谓不丰，但多将孔裔进

［收稿日期］ 2025－02－21
［作者简介］ 孔勇（1988—　），男，山东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济南 250100，kongyong0708@126.com
［基金项目］ 2024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大一统’观念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塑造”（24&ZD262）阶段性成果。

① 近年代表作参见杨念群：《“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年；刘文鹏：《论清代历史地位》，《史学理论研究》2024 年第 1 期；朱浒：《“17 世纪危机”冲击下中国和欧洲的国家构建》，《中国社会科学》2025 年第 1 期。

讲视作程式化仪典装扮，并未细致分析其间缜密的政治运作过程。① 关于孔尚任的研究亦何其繁多，却往往聚焦于其交游网络、罢官疑案及文学作品《桃花扇》等相关论题。② 这种关注点上的各自侧重，极易使人忽视一个现象，即孔尚任早在因文学成就享名于世之前，已是清初政治发展与士风变动的见证者和参与者。鉴于此，本文以孔尚任阙里御前进讲为中心，探讨与之相关的仪典议定、讲章撰拟、皇权与士林的互动、学术与政治的张力及其所产生的绵延影响，希冀推进对清代前期治道关系等问题的理解。

一、孔僖“故事”及其后世回响

清代以前，历朝褒崇孔子、优渥孔裔之举史不绝书，经历了漫长繁复的演进过程。③ 最具象征意义的举动，当属皇帝亲至曲阜阙里祭孔。汉高帝十二年（前 195）十一月，刘邦“行自淮南还。过鲁，以大牢祠孔子”。④ 同时，“封（孔子）九代孙滕为奉嗣君”。⑤ 此举常被称引，誉之者曰：“高皇帝虽在倥偬，犹能修其祠于过鲁之日。”⑥ 但结合汉初情势，实也难掩其间矫饰之意，并未确立儒生在庙堂的主导地位。直至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普遍看作汉室以儒立国之始。下迄东汉，明帝、章帝、安帝相继仿循汉高旧事，借东巡之机躬诣阙里。另有北魏孝文帝、后周太祖、宋真宗等三朝君主，接踵其后，展拜林庙，成为史家必书的话题。⑦

在天子和孔子之间，孔氏后裔起到了重要的架梁作用。黄进兴即说：“政权之兴衰、孔家之荣枯与祀孔之存续诚息息相关，难以分割。”⑧ 如何因势调整彼此之间的角色和定位，融洽处理“治”与“道”之间的敏感关系，是同时摆在天子和孔裔面前的一道棘手命题。在孔尚任接触康熙帝的一千六百年前，汉代孔僖也曾身处相似情境，而他给出的解答又常被奉为前代“故事”，引发后世的持久回响和竞相比慕。

东汉章帝元和二年（85）三月，“帝东巡狩，还过鲁，幸阙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乐，大会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讲《论［语］》”。⑨ 孔子第十九代孙孔僖置身此会，并与章帝有过一番对话：

> 帝曰：“今日之会，宁于卿宗有光荣乎？”对曰：“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今陛下亲屈万乘，辱临敝里，此乃崇礼先师，增辉圣德。至于光荣，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圣者子孙，焉有斯言乎！”⑩

---

① 商鸿逵：《论清代的尊孔和崇奉喇嘛教》，《社会科学辑刊》1982 年第 5 期；李林：《清代皇帝的南巡与东巡》，《清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赵秉忠：《论乾隆帝躬诣阙里祭孔》，《社会科学辑刊》1991 年第 6 期；郭松义：《曲阜“孔府档案”中记载的乾隆南巡和东巡》，故宫博物院、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故宫博物院八十华诞暨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2006 年，第 624–633 页；黄进兴：《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修订版）》，中华书局，2010 年；董喜宁：《孔庙祭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近年，有学者关注到康熙帝阙里祭孔的“应制书写”话题，讨论的文本即包括衍圣公孔毓圻等编《幸鲁盛典》和孔尚任所撰《出山异数记》等文献。参见殷红：《康熙朝的政治与文学：以南书房翰林群体的应制创作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 年，第 232–253 页。

② 吴新雷：《孔尚任和〈桃花扇〉研究的世纪回顾》，《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9 年第 2 期；高寿仙：《孔尚任罢官疑案探微》，《古代文明》2019 年第 1 期。

③ 参见董喜宁：《孔庙祭祀研究》，第 91–103 页。

④《汉书》卷 1 下《高帝纪下》，中华书局，1962 年，第 76 页。

⑤ 孔传：《东家杂记》卷上，山东友谊书社，1990 年，第 41 页。

⑥ 徐天麟：《东汉会要》卷 5《礼三·祠孔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第 60 页。

⑦ 有学者指出，以往认为东汉光武帝、北魏太武帝、唐高宗、唐玄宗等四位皇帝曾到阙里祭孔，实际上是遣官致祭。参见董喜宁：《孔庙祭祀研究》，第 261 页。

⑧ 黄进兴：《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修订版）》，第 165 页。

⑨《后汉书》卷 79 上《孔僖传》，中华书局，1965 年，第 2562 页。

⑩《后汉书》卷 79 上《孔僖传》，第 2562 页。

《连丛子》对此记叙尤详：

> 子和（孔僖）自陈曰："臣草莽所蔽，才非干时，行非绝伦，托备先圣遗嗣，世名学家，陛下误加拔擢微臣兰台令史。会值车驾东巡，先礼圣师，猥以余福惠及臣宗，诚非碎首所能报谢。"诏曰："治何经？"对曰："为《诗》《书》，颇涉《礼》《传》。"诏曰："今日之会，宁于卿宗有光荣乎？"对曰："非所敢当也。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而贵道。今陛下尊臣祖之灵，贵臣祖之道，亲屈万乘，辱临敝里，此乃陛下所以崇圣也。若夫顾其遗嗣，得与群臣同受禧福，此乃陛下爱屋及乌，惠下之道。所以崇德作圣，臣宗弗与于光荣，非所敢承。"天子叹曰："非圣者子孙，恶有斯言！"[①]

通常认为，汉章帝与孔僖的往还问答，"不只生动地反映了人君祀孔的心态，并且透露了孔门子弟自尊自贵的精神"。[②]孔僖所称"增辉圣德"云云，精准契符帝意，又自觉归美于上，无形之中消解了话语背后隐含的试探和紧张。"至于光荣，非所敢承"一语，既可引申为"非所应承"，因为天子祀孔乃是"崇德作圣"，本与孔裔无涉，又可理解成"非所私承"，毕竟"群臣同受禧福"，孔氏也与有荣焉。要之，这番答词凸显并拓延了章帝阙里祀孔的精蕴和奥旨。

在历史上，孔僖素有直正之声，上述对话亦非孤例。元和元年，僖与友人崔骃径论汉武末年政失，为邻房生梁郁构陷，罪其诬谤先帝，刺讥当世。为此，孔僖特呈章帝自讼疏文，蒙恩立诏勿问，旋拜兰台令史。[③]两事相叠，士林称论，被塑为君臣洽遇的典范"故事"，时供君主披览研思。

比如，明代万历朝日讲官冯琦曾为神宗讲论《通鉴》，特列"以孔僖为兰台令史"条，缕析臣言之恶直与人主之威恩。冯氏加按语曰："所以人主意向，最不可使人窥伺。一可窥伺，即成风尚，其流弊不可胜言。僖等方见推问，岂敢遽望宽释。既宽其罪，复加以官，不测之威与不测之恩，相兼并用，章帝之操纵善矣。"[④]同时代的熊尚文，采编史传旧文，随事论断评注，撰成《兰曹读史日记》。他也着意征引孔僖自讼全文，认为"三代直道，原不容泯，必欲臣民讳言先朝失德，固非所以昭是非之公"。孔僖言行颇契夫子"直在其中"要义，"道理毕竟当如此"。[⑤]

至清代，雍正朝枢臣朱轼撰历代名儒、名臣和循吏传记，冠曰《史传三编》。孔僖被选列名儒，传文基本照录《后汉书·孔僖传》，后附"论曰"显露出作者的真实心绪，内称："夫孔子者，百王之师也。帝自师其师，而以为私家荣，可乎？僖之持论侃侃，不惮批鳞。盖自其谈史大学时，已不复有嗫嚅之态矣……何圣裔之多贤也。"[⑥]既凸显孔子堪膺百王之师，又称誉孔僖直正秉性，为当世孔裔和士林同道提供了可以反观自身的范例。

孔僖和章帝的故事，同样收进了阙里志书、孔氏家谱等圣门文献，[⑦]熟谙家史的孔尚任自是不会陌生。只是时过千载，王朝数易，随着孔子之道越发受到推崇，阙里林庙亦愈加恢宏壮丽。孔尚任恐怕未曾料想，他有一天也会像遥远的先辈一样，在阙里迎来天子驾临，并彻底影响了自己的余生浮沉。那么，他又将给出怎样的答案呢？

---

① 王钧林、周海生译注：《孔丛子》卷7《连丛子下第二十三》，中华书局，2012年，第316页。
② 黄进兴：《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修订版）》，第151页。
③ 《后汉书》卷79上《孔僖传》，第2560–2561页。
④ 冯琦：《宗伯集》卷40《日讲通鉴直解》，《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5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508页。
⑤ 熊尚文：《兰曹读史日记》卷1《汉章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86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199页。
⑥ 朱轼：《史传三编》卷2《名儒传二·孔僖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2页。
⑦ 陈镐撰、孔胤植等增补：《阙里志》卷6《礼乐志》、卷9《人物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76册，第96–97、134页，孔尚任纂：《孔子世家谱》卷3《世系·十九代孔僖》，康熙二十三年孔氏刻朱印本，第14页。

二、阙里讲章的撰拟和裁定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将康熙二十三年驾临阙里看作圣祖首次南巡行程中早已定下的事项，但实际情形远为复杂。常建华指出，康熙帝此行源自古代圣王东巡观风问俗传统，但不举封禅，只祭泰山诸神和孔子；且是在完成泰山祭典之后，临时决定改变路线，先赴江南视河，再祀阙里孔庙。增入新内容，变更旧次序，更加凸显了此次巡幸在政治上的象征性，揭开了清朝“新纪元”的序幕。①

礼部等衙门议定阙里仪注时，援引的近例是康熙八年皇帝亲诣太学释奠之礼。但内容有所调整，包括把祭拜先师的两跪六叩头礼改行三跪九叩头礼，采用阙里乐章和当地乐工等，自此在清代礼制系统中新辟出一个独特单元——“阙里祀典”，单列“先师孔子”祭仪之后。② 同步增入的“阙里讲书仪”，附在“视学仪”下，也是基于康熙二十三年的幸鲁讲学实践。这个环节，恰是康熙帝精心安排并参与计议的结果。

回溯此前历次皇帝亲谒阙里祀孔，明载史册的讲学安排似乎只有两次。一次是东汉永平十五年（72）三月，明帝东巡期间，“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③ 另外一次，便是前引元和二年三月，章帝在阙里命儒者讲《论语》。这两次阙里讲学，盖可纳入东汉前期制礼作乐的重要一环，为后世提供了得以因循的“故事”。④ 但具体由何人讲，讲了哪些篇章，史籍乏载，俱难详知。及至康熙帝驾临曲阜前夕，同样无成例可循，所可据者唯有京师幸学仪注。史载康熙八年四月，“亲释奠毕，驾幸彝伦堂，赐讲官坐。满汉祭酒以次讲《易经》，司业讲《书经》”。⑤ 然而当时亦不过俱沿顺治九年（1652）顺治帝幸学旧制，⑥ 很难说有什么特定旨义。饶是如此，康熙帝仍在首次南巡返程的紧凑间隙，特地补上了阙里讲学事项，且相关细节是在临抵曲阜前一两天内才敲定下来。

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康熙帝乘舆北还。十五日，驾至费县。据《康熙起居注》载，是日太常寺卿葛思泰奉上谕曰：“阙里为圣人之域，秉礼之邦，朕临幸鲁地，致祭先师，正以阐扬文教，振起儒风。祀礼告成，意欲讲明经义，研究心传，以称大典。应否举行，着内阁、部院等衙门会同议奏。”⑦ 这段谕旨后来编入《清圣祖实录》时，个别字句有所调整，尤其没有保留“应否举行”四字，从而隐去了康熙帝对临时补加阙里讲书的探问之意。⑧

当然，这并未影响最终结果。旨下，内阁、各部院会议：“今皇上躬诣阙里……宜行讲书之例。皇上祀礼告成讲书，令讲四书、《易经》内二章，将讲书之人员交与衍圣公，于五氏内（按：孔、颜、曾、孟、仲）不论有无品级，选择学深、讲书明白者二人。应讲书节，令翰林院拟定具题请旨。”⑨ 同时，仿照康熙八年“皇上临雍讲书毕，宣敕于国子监官员及监生”成案，“今讲书毕，亦宣敕谕于衍圣公及五氏官员、子弟可也”。⑩ 议上，奉旨：“敕谕着（大学士）王

---

① 常建华：《新纪元：康熙帝首次南巡起因泰山巡狩说》，《文史哲》2010 年第 2 期。
② 康熙《大清会典》记为“阙里祀仪”，雍正、乾隆、嘉庆、光绪《大清会典》写作“阙里祀典”。
③《后汉书》卷 2《明帝纪》，第 118 页。
④ 王尔：《两汉承续与新汉本位：东汉前期政治文化实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 年，第 213–274 页。
⑤《清圣祖实录》卷 28，康熙八年四月丁丑。
⑥《清世祖实录》卷 68，顺治九年九月辛卯。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 2 册，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华书局，1984 年，第 1252–1253 页。
⑧《清圣祖实录》卷 117，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丙子。
⑨ 孔毓圻、金居敬等：《幸鲁盛典》卷 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52 册，第 45–46 页。
⑩ 孔毓圻、金居敬等：《幸鲁盛典》卷 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52 册，第 46 页。

熙宣读，应讲书节着翰林院、衍圣公会同选出讲书人员拟定具题。”[①] 身处行在的康熙帝，基本全程参与了阙里讲书主要仪节的设定，以示对“大典”之关切和重视。

翰林院掌院学士常书、侍读学士朱玛泰接旨之后，隔日即先抵曲阜，安排讲书仪节。一是把进讲内容固定下来，依次为《大学》首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和《易经·系辞》首节（“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二是会同孔子第六十七代孙、衍圣公孔毓圻，选定第六十四代圣裔、监生孔尚任撰写两篇讲章。

孔尚任曾云：“予自少留意礼乐兵农诸学，亦稍稍见之施行矣。”[②] 时贤和后世亦称其“精于音律”,[③] “博学有文名，通音律，谙祖庭典故”。[④] 康熙二十一年，孔尚任受衍圣公孔毓圻敦请出山，助其治夫人张氏之丧。次年又延至祖庭，修谱编志，“并选邹、鲁弟子秀者七百人，教以礼、乐。更采访工师，造礼、乐祭器”。二十三年秋，“礼既成，将还山，恭闻天子东巡，有事阙里，宗公族姓复留任襄祭事”。[⑤] 这些因素汇在一起，使孔尚任成为此次御前讲书的不二人选。

十六日深夜，在常书、朱玛泰两学士和山东巡抚张鹏、衍圣公孔毓圻注目下，孔尚任起初“刻烛五分，不成一字”，似还未从“以藐小儒生，选侍经筵”的震荡状态之中回神。迨孔毓圻为之别置几案，孔尚任才重整思路，“不移晷而《大学讲义》成”。[⑥] 限于史料，我们无法一睹这份讲义的原始面貌，但它很可能获得了在场诸公的总体认可。因当时的御前讲章已有固定格式,[⑦] 经山东巡抚张鹏提醒“讲义是矣，后段颂圣，亦不可少者”,[⑧] 孔尚任遂应声补足。随后，常书又续促孔尚任写就《易经·系辞》首节讲义。朱玛泰读后亦感满意，赞曰：“名下固无虚士。”[⑨] 便缮写封缄，与常书赶赴行宫复命。

上述撰拟讲章的经过，仅见于孔尚任一家之言，不排除个别细节或有夸饰之嫌。纵使这两篇文字确乎出众，也只可暂称初稿，其最终样态尚需康熙帝裁定。十七日午后，驾至曲阜，驻跸城南，首要事项即是命改讲义。对于改动内容，官私记载却有偏差。据孔尚任忆述，他于当日薄暮时分应诏来至行宫，“跪幔城外，请圣安毕”。翰林院掌院学士孙在丰传旨云：“所撰讲义虽好，但有数字未妥，即令改易。”孙在丰逐一指示应改之处，“隐有掐痕，盖出睿鉴也，遂更拟数字呈御览讫”。[⑩] 倘若孔尚任所述真切，则明显能够看出康熙帝对其讲义褒誉有加。对照而观，起居注官记下的康熙口谕则直指讲义“要害”，甚至是严苛批评：“上览毕，顾常书等曰：‘所撰讲章文字尚未得其精微，其篇末排语平仄亦少不调，音韵无伦。大典关系綦重，不可不加详酌。’”并且指示常书等人：“尔等可以此讲章与大学士王熙、学士孙在丰共相更定。”[⑪] 易言之，从内容到形式，孔尚任撰呈的讲章均与康熙帝期许的理想文本还有不小差距。

遵照康熙帝谕示，王熙、孙在丰着手修订讲稿，“更定讫，随呈御览，上称善”。[⑫] 至此，两

---

① 孔毓圻、金居敬等：《幸鲁盛典》卷 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52 册，第 46 页。

② 李塨：《大学辨业·题辞》，陈山榜等点校：《李塨集》下册，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930 页。

③ 王士禛：《居易录》卷 18，袁世硕主编：《王士禛全集》第 5 册，齐鲁书社，2007 年，第 4033 页。

④ 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 77《孔尚任传》，周海生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第 610 页。

⑤ 孔尚任：《出山异数记》，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 4 册，齐鲁书社，2004 年，第 2335 页。

⑥ 孔尚任：《出山异数记》，《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 4 册，第 2336 页。

⑦ 清代经筵讲章主要由六部分组成，即标题、揭示主题、详解文意、讲官发挥演绎、颂词、祝福。参见陈东：《清代经筵制度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年，第 39–40 页。

⑧ 孔尚任：《出山异数记》，《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 4 册，第 2336 页。

⑨ 孔尚任：《出山异数记》，《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 4 册，第 2336 页。

⑩ 孔尚任：《出山异数记》，《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 4 册，第 2336 页。

⑪ 《康熙起居注》第 2 册，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第 1253 页。

⑫ 《康熙起居注》第 2 册，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第 1253 页。王熙自定年谱称“奉旨同翰林学士孙在丰撰拟讲章”，欠准确。参见王熙：《王文靖公集》附录《年谱》，《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09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454 页。

份讲章方称底定，并由孙在丰等各誊两本，恭陈已经安设在阙里孔庙诗礼堂的御案和讲案之上。因御前进讲须得两生，孔尚任另荐族兄举人尚鉝，分讲《大学》和《易经》。奏允之后，两人便在扈从鸿胪寺少卿等人示范之下，研习进讲仪节和声音容止，为即将到来的大典做最后准备。接下来十八日的故事，今人已经至为熟悉：康熙帝在曲阜孔庙大成殿先师位前行三跪九叩礼；至诗礼堂听讲；瞻圣像，观礼器，览图书，摩植桧，尝孔井水，诣孔林墓，书“万世师表”，留曲柄黄盖。[①] 凡此种种，确称仪文之盛。孔尚任与衍圣公孔毓圻等人一道，陪侍宸游，时为说解。特别对于孔尚任来说，上谕以其“陈书讲说，克副朕衷，着不拘定例，额外议用”。[②] 其后立授国学博士，肇启宦海生涯。此番际遇，自然会令孔尚任想起汉代的孔僖“故事”，十余年后仍在欣赞：“知遇之隆，自汉章帝召兰台令而后仅见今日也。”[③]

三、讲章何谓“称善”？

康熙帝钦改孔尚任讲章，显然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早已成竹在胸。抵达阙里的十几天前，他曾在号曰人文渊薮的江南之地，纵谈自己勤学好思，涉猎群籍。所谓“自五龄即知读书”“日所读者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期见之施行”云云，意在表明其浸学之深且黜虚务实。[④] 这些话语，载之汉文本起居注册，尽管可能包含史官着意称美“圣君”崇儒特质的“私心”，[⑤] 却也不失为对康熙帝长久以来研习经史以求致用的可靠记录。

最直观的一项印证，是康熙前期经筵日讲的制度化实践。经筵日讲是古代帝王接受经史教育的重要途径。一般来说，经筵专指仲春、仲秋两次御前讲席的开讲典礼，日讲则指经筵大典以外的御前进讲。[⑥] 清初，满洲权贵一度抵制汉文化，直至顺治十二年才举行日讲，两年后重开经筵。其间时举时废，并不固定。康熙帝清除鳌拜势力之后，正式将经筵日讲稳定下来。据学者统计，康熙朝日讲坚持了15年（康熙十年至二十五年），总计896次；经筵则持续了46年（康熙十年至五十六年），共计60次。经筵日讲对规范帝王行为、制定各项政策、巩固朝廷统治产生了直接影响。[⑦]

康熙十年二月初，命工部尚书王熙、翰林院掌院学士熊赐履等16人充经筵讲官，满、汉各半。[⑧] 同月十七日，首举经筵。自此，四书及《尚书》《易经》《诗经》《资治通鉴》等儒家经典和历代史鉴，成为康熙前期经筵日讲的重要内容。但随着年齿、阅历日增，康熙帝逐步跳出旧有的惟讲官敷陈模式，变为君臣互有阐发，适时辩难驳议。这不但帮助其深入掌握经史要义，也悄然扭转着帝师角色，并建立起一套独特的“帝王经学”。[⑨]

围绕讲章的内容、措辞乃至格式，康熙帝时常指摘评议，命予修改。比如康熙十四年二月，经筵讲官拟定讲章进呈。上览之后，谕曰：“讲章内书写称颂之言，虽系定例，但凡事俱宜以实。如‘秉至诚而御物，体元善以宜民，固已媲美三王，跻隆二帝’等语，似属太过。”[⑩] 遂令重

---

① 《清圣祖实录》卷117，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己卯。
② 孔尚任：《出山异数记》，《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4册，第2339页。
③ 宫衍兴编著：《孔尚任佚文遗墨》，济宁市新闻出版局，1994年，第7页。
④ 《康熙起居注》第2册，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第1249页。
⑤ 张勉治：《康熙皇帝首次南巡与文武价值观念之间的对立》，刘文鹏、王珏译，《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
⑥ 陈东：《中国古代经筵概论》，《齐鲁学刊》2008年第1期。
⑦ 赵秉忠、白新良：《经筵日讲与康熙政治》，《清史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3–29页；陈东：《康熙朝经筵次数及日期考》，《历史档案》2014年第1期。
⑧ 《清圣祖实录》卷35，康熙十年二月丙戌。
⑨ 黄爱平：《清前期官修经解与官方经学探析》，《清史研究》2021年第5期。
⑩ 《清圣祖实录》卷53，康熙十四年二月乙巳。

新改写。相似的话，在次年二月举行经筵时也曾说过："嗣后经筵讲章，称颂之处，不得过为溢辞，但取切要，有裨实学。"[1] 由此便易想见，康熙帝径指孔尚任讲章的诸种问题，另谕大学士王熙等人更改，不会使扈从臣僚感到特别惊奇。

更何况，驾幸阙里时的康熙帝已不复为昔日少年天子。积累十余年的经筵日讲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系列御纂解义，使儒家学说逐步镌刻了鲜明的皇权烙印。康熙十六年，四书讲毕，喇沙里、陈廷敬奉旨编定满、汉文本《日讲四书解义》。是书共二十六卷，"所推演者，皆作圣之基、为治之本，词近而旨远，语约而道宏。圣德神功所为契洙泗之传而继唐虞之轨者，盖胥肇于此矣"。[2] 十九年至二十三年间，转入讲习《易经》。[3] 二十三年四月，颁行《日讲易经解义》凡十八卷，"其体例与宋以来奏进讲义大致略同，而于观象之中，深明经世之道"。[4] 阙里讲学被视作缩小的经筵，[5] 在此场合选定康熙帝已经相当熟稔的《大学》和《易经》两节内容，且关乎人君立身、王朝立治，自是符合大典之需。[6]

康熙帝评论孔尚任讲稿内容"尚未得其精微"，可见他已自恃支配了儒家经典解释之权，可以点评、批驳这些来自"邹鲁圣贤之乡"的"学问淹通之士"。[7] 大学士王熙身为康熙朝首批满、汉 16 位经筵讲官之一，先后 10 次直讲经筵；孙在丰位尊翰林掌院，充日讲官屡称旨。[8] 他们无不深谙此中要义，是以着手修订孔尚任讲稿之时，内心实则有着明确的参比对象，那就是上面这两部御纂日讲解义。康熙帝再次阅览讲章并"称善"认可，意在强调阙里讲学并非任由孔氏后裔阐发一家之言，只不过借其声口将御定经解宣示天下，以为此次盛典增辉。

尽管官私层面均没有保存这两份讲章原稿，但钦改之后的进讲本却留了下来，首见于孔尚任事后所作《出山异数记》。随着衍圣公孔毓圻等编《幸鲁盛典》录其全文，[9] 加之该文被张潮辑入《昭代丛书》乙集，[10] 它们的具体内容方呈现在世人面前。有学者据此认为："尚任以文学名家，世人但知《桃花扇》《湖海集》，殊不知其经学亦自渊源深厚，涉笔成文。"[11] 然而，单就这两份讲章来看，很难说能够反映孔尚任"深厚"的经学基础，因为其文字基本照引自御纂经解。不妨选取《大学讲义》与《日讲四书解义》卷一《大学》相关部分加以对读，立能发现两者的主旨和行文均高度一致。

如对《大学》首章首节之定位，《讲义》曰："此一章书，是言修己治人内圣外王之要道，乃《大学》一书之纲领；此一节，又圣经一篇之纲领也。"《解义》则称："此一章书，是曾子述孔子之言，乃修己治人之要道，谓之经文，为《大学》一书之纲领；而此一节书，又经文之纲领也。"紧接着解释"在明明德"，《讲义》写道："德者，命于天而赋于人，至虚至灵，具众理而应万事，本明者也。但为气禀物欲所拘蔽，则明者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用 [明]，未尝或息，

---

① 《清圣祖实录》卷 59，康熙十五年二月己未。

② 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 36《经部三十六 · 四书类二》，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955 页。

③ 杨自平：《从〈日讲易经解义〉论康熙殿堂〈易〉学的特色》，《台大中文学报》第 28 期，2008 年。

④ 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 6《经部六 · 易类六》，第 147 页。

⑤ 衍圣公孔毓圻后来撰诗，即有"圣主崇经学，筵开诗礼堂""更御经筵座，还升诗礼堂"等句。孔毓圻撰，孔继汾、孔继涑辑：《兰堂遗稿》上卷，乾隆九年刻本，第 6a 页、10a 页。

⑥ 戴景贤分析说，阙里进讲先《大学》后《易经》，"此点显示儒家义理，乃由'人'之实有，以上溯'天'之本然，其性质属人文性，而非宗教性"。戴景贤：《从〈出山异数记〉与〈桃花扇〉之写作论孔尚任之民族情怀及文明史观》，中国明史学会、盐都区人民政府编著，陈支平主编：《孔尚任与盐城：孔尚任暨盐都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77 页。

⑦ 《康熙起居注》第 2 册，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第 1253 页。

⑧ 陈涵君：《康熙朝经筵直讲官群体研究》，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年，第 32–35 页。

⑨ 孔毓圻、金居敬等：《幸鲁盛典》卷 6，《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52 册，第 66–68 页。

⑩ 张潮辑：《昭代丛书》乙集卷 18，《丛书集成续编》第 40 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年，第 20–21 页。

⑪ 周洪才：《孔子故里著述考》，齐鲁书社，2004 年，第 97 页。

必因其善端之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此《大学》之所以立体也。”《解义》的表述是：“德者，天所赋于人心，至虚而无所累，至灵而无所蔽，能包函众理而酬应万事，故谓之明德。德本明，而气禀拘于有生之初，私欲蔽于有生之后，则明者有时而昏矣，然其本体之明自在也。故必因其一端之发露而致力以明之，使复其本然至虚至灵之全体，方为有本之学也。所以大人之学在明明德。”① 余下依次阐发“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两者语式、措辞亦是差异至微。唯《讲义》篇幅稍短，盖因阙里讲书受特定时空所限，无法像在内廷那样从容展开，故此做了一定精炼。这种特点，同样贯穿于《易经·系辞》首节讲义和《日讲易经解义》相应文字之中。②

孔尚任初拟讲章篇末排语，曾被康熙帝斥为“平仄亦少不调，音韵无伦”。这对向以“通音律”著称的孔尚任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置身阙里的康熙帝，一改经筵日讲初期的矜持和谦抑，更加乐闻以往被他要求“不得过为溢辞”的称颂之言。经过修改，两份讲章最后写着“睿谟炳照，圣学缉熙，精一远溯唐虞，性道亲承洙泗”“至德体乾，圣功开泰”等文句。③ 它们与经义阐释一道，构成了完整的进讲文本，无疑相当投合帝心。④

四、“圣君”形塑与士大夫心态

康熙二十三年南巡之行，时逾两月，周历数县，触及“泰山”“江南”“阙里”等关涉王朝政治的领域，对形塑“圣君”形象、调适治道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姚念慈注意到：“玄烨再一次大煽崇儒之风，是从二十三年南巡开始的。此前一年，他似乎还未将提倡理学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来考虑。”南巡呈现的诸种非凡举动，“表明玄烨欲继承中原正朔，重新积极寻求汉族士大夫的支持”。⑤

充任御前讲官的孔尚任等圣贤后裔，与随驾臣僚一道，在歌咏“圣君”的舞台上扮演了领唱角色。这些声音化作文字，载于私记公牍，遍传天下士林。据孔尚任记载，当他陪侍康熙帝周览孔庙各处后，上问：“尔家古迹看完否？”孔尚任回奏：“先圣遗迹，湮没已多，不足当皇上御览，但经圣恩一顾，从此祖庙增辉，书之史册，天下万世想望皇上尊师重道之芳躅，匪直臣一家之流传。”听闻至此，从旁的王熙、孙在丰等人也及时跪称“孔尚任所奏甚是”。⑥ 随后，康熙帝亲取御制《过阙里诗》，赐衍圣公孔毓圻，并由孔尚任现场诵念。捧读天章，殊荣逾分，更加激荡了孔尚任心中波澜，奏称：“从古帝王过阙里，惟唐明皇有五言律诗一章，止叹圣生衰周，有德无位，而全无悦慕赞美之辞。伏睹御制新篇，超今轶古，景仰圣道，不啻羹墙。臣何家幸，膺兹宠锡，谨世世守之，奉为典谟焉。”⑦ 这种欣喜雀跃，无时无刻不萦绕在孔尚任脑际。从孔庙到孔林，从阙里到京师，“荷皇上温示优容之恩，随路感泣，逢人称述”。⑧ 康熙二十四年春，他撰成《出山异数记》长文，仍在慨叹“书生遭际，自觉非分，犬马图报，期诸没齿”。⑨

---

① 孔尚任：《出山异数记》，《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 4 册，第 2337–2338 页；喇沙里、陈廷敬等奉敕编：《日讲四书解义》卷 1《大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208 册，第 8–9 页。

② 孔尚任：《出山异数记》，《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 4 册，第 2338–2339 页；牛钮等奉敕撰：《日讲易经解义》卷 15《系辞上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37 册，第 606–607 页。

③ 孔尚任：《出山异数记》，《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 4 册，第 2338–2339 页。

④ 据孔尚任自述，康熙帝对其进讲很感满意：“天颜悦霁，顾侍臣曰：‘经筵讲官不及也。’”孔尚任：《出山异数记》，《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 4 册，第 2338 页。

⑤ 姚念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年，第 86–87 页。

⑥ 孔尚任：《出山异数记》，《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 4 册，第 2341–2342 页。

⑦ 孔尚任：《出山异数记》，《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 4 册，第 2342 页。

⑧ 孔尚任：《出山异数记》，《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 4 册，第 2344 页。

⑨ 孔尚任：《出山异数记》，《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 4 册，第 2346 页。

进讲《易经》的孔尚鉝，后来致信友人颜光敏说："恭遇翠华临祀阙里，弟辈得与讲筵，遂蒙顾盼，渥恩殊宠，真逾涯分！而又特除清华之班，俾得雍容讨论，肆力古学，皇恩高厚，匪可言述。"[①] 另有旧雨新知，虽未置临现场，每当言及甲子旧事，也不禁遥想当年盛况。康熙二十七年，孔尚任的诗文集《湖海集》编成，友人黄云为之作序，内言："翠华幸鲁，公说书御前，琅琅耸听，大称旨是。又先从经学受知，公岂非当代之兼才耶！"[②] 十年后的康熙三十七年冬，孔尚任与刻书家张潮订交不久，便打消了"嫌于自媒"的心理顾忌，邮示《出山异数记》，以期列入后者所辑《昭代丛书》。[③] 张氏阅后同感荣光，建议更改书名为《幸鲁承恩私记》，给出的理由是："盖驾幸阙里，自是朝廷尊师重道，超越古今盛举，初非一人一家之事。而史馆所纂修《盛典》一书（按：《幸鲁盛典》），又非草野儒生所能窥见，正赖先生此篇有以知其详悉。而先生之独蒙异数，则又出于寻常一切之上，读之令人感发而兴起。"[④] 尽管孔尚任婉谢了更名之议，该书仍然被列入《昭代丛书》乙集，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当年皇帝幸鲁、优渥圣裔的诸般细节，也进一步扩散了阙里祀典的礼制效果。[⑤]

官方出面组织的"应制"活动，则以更加系统的方式记录下康熙帝阙里之行的各个环节及其引来的群声颂扬。康熙二十四年四月，衍圣公孔毓圻疏请纂修《幸鲁盛典》，得旨允行。历时三年，初步成书十八卷。奏进呈览后，获赐御制序文，冠于全书之首。其后，又相继收录扈从部院诸臣及在廷臣僚所作诗、赋、颂、记等各类文字，终使该书扩成四十卷篇帙，前二十卷为"事迹"，后二十卷为"艺文"。[⑥] 最初动议编纂此书时，孔毓圻在呈疏中提到了康熙帝离开阙里之后的情况，这也成为他纂书缘由之一。其中说：

> 四方人士来登阙里者，瞻仰宸章御盖，焜耀庙庭，无不致敬，忭舞导扬。又必问臣以释奠之仪文，进讲之大义，与夫拜飏之次第，赉予之优渥，务必细询，臣应对且日不暇给。臣因思圣主隆规，自炳于起居之注；而尼山道统，不可无纪盛之书。臣愚特吁圣恩，容臣裒辑典章，胪陈仪制，皇上顾问之天语，群僚奏对之昌言，臣族受恩之始末，扈从入庙之班联，一一恭纪，纂成《幸鲁盛典》一书，以昭示臣民，使共获快睹。在臣家则传之子孙，与《论语》《家语》诸书同垂天壤矣。[⑦]

可见，本已被士人奉为"圣域"的阙里，经过皇帝驾临展拜，更加焕然增辉。至于《幸鲁盛典》，不仅成为圣贤子孙代代相传、时加敬览的必读书目，更随着乾隆朝纂入《四库全书》，使后世之人"伏读是编，大圣人崇儒重道之至意，犹可仰见其万一"，具备了"昭示无极"的时空穿透力。[⑧]

《幸鲁盛典》后二十卷"艺文"部分，收录了诸多"应制""宣赞"之作，对塑造康熙帝"圣君"形象、建构清朝正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⑨] 这些诗文，无不经过了清廷的精心筛选和裁定。有一个细节可证。《幸鲁盛典》开馆之际，孔毓圻呈请"凡臣僚一应篇什，许其于岁内

---

① 上海图书馆编：《颜氏家藏尺牍》第 8 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100 页。

② 孔尚任：《湖海集》，"黄云序"，《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 2 册，第 691 页。

③ 顾国瑞、刘辉：《孔尚任佚简二十封笺证》，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编：《文献》第 9 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 年，第 137 页。

④ 顾国瑞、刘辉辑：《张潮〈与东塘书〉十八封》，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编：《文献》第 10 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 年，第 63 页。按，笔者对信文标点略有调整。

⑤ 有关《出山异数记》的流传和影响，参见殷红：《康熙朝的政治与文学：以南书房翰林群体的应制创作为中心》，第 249 页。

⑥ 该书直至康熙五十年方以四十卷全帙进呈。参见《清圣祖实录》卷 245，康熙五十年三月丙辰。

⑦ 孔毓圻、金居敬等：《幸鲁盛典》卷 20，《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52 册，第 244 页。

⑧ 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 82《史部三十八·政书类二》，第 2146 页。

⑨ 殷红分析说："应制文学作为皇权建设文本，展现并参与了文治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在仪式、内容、传播向度始终是配合康乾祭孔典礼达成政治意图的重要文学形式，其内容、意象、风格等为贴合祭孔这一独特的政治、文化事件而呈现出殊异风貌。"殷红：《康熙朝的政治与文学：以南书房翰林群体的应制创作为中心》，第 253 页。

各自缮写，邮寄到臣，容臣编辑成书，一体进呈御览”。① 但礼部具题请旨时，却改为：“无论诗、赋、颂、记，俱限于一月内缮写，交与翰林院，由翰林院裁订，送臣部转发。其衍圣公孔毓圻等有作，亦听采录。务择其渊粹有裨风雅者，为艺文一类，附之卷内。”② 不仅明确缩短了时限要求，而且对作品内容也至为审慎。唯如此，“非特益孔庭家乘之荣，实以征圣代文治之盛。如此则我皇上尊崇至圣之意，奕祀光昭，而臣子颂扬踊跃之情，亦得以稍抒万一矣”。③

《幸鲁盛典》“艺文”部分的作者，上自朝中要员如大学士王熙，远及地方官员如江西吉安府知府刘德新，共 185 人，加上部分纂修人员和五氏后裔 26 人，共 211 人，计诗文 211 篇。④ 更可注意者，众人立论的落脚点，多是称美康熙帝已是治与道偕隆，君与师兼作。此举不仅打造了一个完满理想的“圣君”形象，也在很大程度上将士人原本自据的“道统”让予皇帝，印证了黄进兴所说：“‘圣君’的来临却使他们付出昂贵的代价，因为儒者得以批判政治权威的立足点亦随之烟消云散。”⑤

孔尚任做何感想呢？《幸鲁盛典》末卷也收录了孔尚任的一首长律，凡二百字，除了纪叙他所亲历亲睹的阙里祀孔盛况，更特别谈到了御前进讲带给自己的切身感受。其中有这样几句：“经筵亲咫尺，讲位出班行。盛典逢非偶，曲儒喜若狂。欲裁三大赋，词陋愧抒扬。”⑥ 写作此诗时，孔尚任的身份署作“户部广东清吏司员外郎”，却仍自称“曲儒”，以示感念君恩，无时或忘。孔尚任大概知道，这些文字终将进呈至康熙帝面前，故而拟词落笔之时别有一番考究。只是他恐怕不会预料到，康熙三十九年三月，萦绕脑际的“圣君”即以“孔尚任材庸而品滥”，⑦ 革除其全部差使，展现出另面的凌冽之威。

星霜荏苒，“盛世”绵延。皇帝再次驾幸曲阜，已是乾隆十三年（1748）。是年仲春，乾隆帝循着皇祖足迹和成例，亲祀阙里，致祭先师。御前讲书同样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命举人孔继汾进讲《中庸》‘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节，贡生孔继涑进讲《周易》‘临卦象辞’”。⑧ 内容虽有调整，用意则一如其旧，这在宣谕孔子第七十一代孙、时任衍圣公孔昭焕的文字中亦有体现，内称：“念尔等令绪相承，渊源勿替，再申告谕，用是训行。其务学道敦伦，修身慎行，克禀先师之彝训，祇遵皇祖之诲言，勿愧为圣者子孙。”⑨ 由此开始，乾隆帝先后共八次亲祭阙里孔庙，礼奉先师，优渥圣裔，堪称清廷崇儒重道、笼络士林过程中最为隆重的举动。吊诡的是，乾隆十三年获蒙进讲的两位圣裔讲官孔继汾、孔继涑，也像当年孔尚任一样，得失荣枯，俱系君赐，逐步踏上了跌宕起伏的变幻人生。⑩

五、结语

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亲祭阙里孔庙，临时议定孔尚任等“圣裔”御前进讲儒家经典，远非程式化的仪典装扮，实际包含着缜密的政治运作。究其意蕴，并不仅如清廷对外宣称的那样阐扬文教、振起儒风，亦是康熙帝把政治权势渗入思想文化领地的统治举措。孔尚任受命撰拟

① 孔毓圻、金居敬等：《幸鲁盛典》卷 20，《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52 册，第 250 页。
② 孔毓圻、金居敬等：《幸鲁盛典》卷 20，《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52 册，第 251 页。
③ 孔毓圻、金居敬等：《幸鲁盛典》卷 20，《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52 册，第 251 页。
④ 黄立振：《孔尚任佚文三则》，《齐鲁学刊》编辑部编：《古典文学专号》，1983 年，第 181 页。
⑤ 黄进兴：《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修订版）》，第 105 页。
⑥ 孔毓圻、金居敬等：《幸鲁盛典》卷 40，《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52 册，第 495 页。
⑦ 台北故宫博物院编：《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 14 册，康熙三十九年三月初九日，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9 年，第 7857 页。
⑧《清高宗实录》卷 309，乾隆十三年二月己卯。
⑨《清高宗实录》卷 309，乾隆十三年二月己卯。
⑩ 孔勇：《乾隆朝〈孔氏家仪〉禁毁案新探——基于礼仪冲突与官绅矛盾双重视角的研究》，《文史》2017 年第 4 辑。

《大学》和《易经》两节讲章初稿，历经康熙帝批驳和大学士王熙、孙在丰等人重新修订，最终方御览称旨，宣示于外。讲章立意、措辞、格式等各个环节，受到康熙朝经筵日讲的深刻影响，与御纂《日讲四书解义》和《日讲易经解义》高度契合，昭示出阙里讲学的本质是融学术于政治，化经义为君心，冀收垂范天下之效。阙里讲学作为祀孔盛典的重要一环，引发了圣贤后裔和士大夫群体的颂扬。衍圣公孔毓圻等疏请纂修的《幸鲁盛典》，半数内容为扈从部院诸臣及在廷臣僚所作诗、赋、颂、记等各类作品。它们与孔尚任的《出山异数记》等文字一道，对形塑康熙帝“君师兼作”“治道合一”的“圣君”形象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对当时乃至其后的士林风气产生了绵延影响。儒士大夫将“道统”归于“治统”，虽由此减弱了对皇权的批判力度，却是因应现实情境所做的主动调整。

References

Chang Jianhua.“Xin jiyuan:kangxidi shouci nanxun qiyin taishan xunshou shuo”(A new era:Emperor Kangxi’s first southern tour arising from inspecting Mount Tai).*Wen shi zhe* (Journal of Literature,History and Philosophy)2(2010).

Dong Xining.*Kongmiao jisi yanjiu*(A study of Confucian Temple worship).Beijing: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2014.

“Descendants of the Sage” and “Sage Monarch”: The Academic and Political Aspects of Kong Shangren’s Lecture at Queli

KONG Yong (School of History, Shandong University; kongyong0708@126.com)

Abstract: In the eleventh month of the twenty third year of the reign of Emperor Kangxi, on his way back from his first southern tour, Emperor Kangxi personally paid homage to the Confucian Temple in Queli and temporarily decided that “descendants of the sage” such as Kong Shangren would give lectures on Confucian classics. This wa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shape the image of the emperor as a “sage monarch” an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legitimacy of the dynasty. Kong Shangren was ordered to draft two sections of sermons, namely the *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 *Yi Ching*. After going through the process of being rejected by imperial edicts and revised by officials, Kong finally presented the sermons as imperial edicts and made them public. The conception, wording, format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sermons were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imperial compendium *Daily Lectures on the Four Books* and *Daily Lectures on the I Ch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daily lectures at the Imperial Court.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purpose of the lectures at the Imperial court was to integrate academic knowledge with politics, to transform the meaning of the classics into the heart of the emperor, and to set an example for the whole world. Confucian scholars and officials attributed the “Dao Tong” to the “Zhi Tong”, although this weakened the criticism of imperial power, it was an active adjustment made in response to reality.

Keywords: Emperor Kangxi, Kong Shangren, Queli, the Daily Lectures at the Imperial Court (*Jingyan Rijiang*), unity of “Zhi Tong” and “Dao Tong”